

升讀專上教育的成功與障礙因素： 香港主流和非主流學生的異同

袁月梅*、張志強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梁長城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

鄧希恒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

陳仲熙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升讀專上教育（專教）一直被視為香港青年上游的途徑，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所面對升讀專教的挑戰各有差別。近年，香港教育政策推動多元發展並提供多項支援和計畫，以提升中學生畢業後的發展路向，但不同學生組群在升學上都遇到不同障礙和不同程度的教育不均情況。由於學生的社經和族群背景影響他們對升學與就業的價值觀、期望和目標，他們追求專教面對的障礙和成功因素各有不同，惟香港對此問題的系統化探討不多。為此，本實證研究探討香港主流、內地來港和少數族裔（南亞／東南亞裔）高中生升讀專教所面對的障礙和成功因素，於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間在 23 所香港中學進行問卷調查，合共成功收回 5,014 名高中生的問卷，發現主流學生雖然在經濟障礙和其他封頂因素的評分均低於少數族裔及新來港學生，但同樣地在多項有利升讀專教的成功因素上的評分亦較後兩者低，而少數族裔則比華裔群體樂觀。本文討論了當中原因，並提供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專上教育；封頂效應；主流學生；內地來港學生；少數族裔學生

* 通訊作者：袁月梅 (yuetmuyuen@cuhk.edu.hk)

引言

在香港，專上教育（專教）一直都被視為青年人向上流動的關鍵因素，是普遍高中生奮鬥的目標和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期盼。近年，香港教育政策推動高中生畢業後參與多元發展，提供多項支援和計畫回應弱勢及少數族裔學生升學需要，惟政策成效不彰。於 2018–2019 學年透過聯招升讀大學課程的人數只有 27.5%，而少數族裔學生人數只有 14.1%（立法會秘書處，2020）。國際文獻指出（Harris & Halpin, 2002），家庭背景、種族文化、自我信念、升學支援和資訊等因素都會影響學生升讀專教的動機和機會。由於中學階層化，家境富裕的學生群體對專教和就業發展比清貧學生一般抱有較高的期許和升學機會，主流和非主流學生在專教路上面對的挑戰和經驗直接影響他們的學習動機，可惜香港相關的研究不多。

背景

香港教育政策：多元發展、生涯規劃和支援服務

香港政府於《2014 年施政報告》提出如何支援青年發揮所長後，《2017 年施政報告》提出「三業三政」的青年發展計畫，到《2020 年施政報告》提出讓青年人把握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和生活，可見青年發展是政府施政的重要範疇，特別是經過 2019 年的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致的社會事件，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引起社會關注（Shek, 2020）。《2020 年施政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2020）指出不少學生對個人前景和社會發展感到困惑、不滿、迷茫與無助，因而推出一系列促進青年到大灣區發展的措施。早前有學者對兩地人才融合發展提出深層思考（呂大樂，2015），修例風波後的香港社會相關建議措施能否為意欲留港發展的青年提供很大誘因，仍需時間驗證。

香港高中課程改革至今，教育局（2017）為協助學生銜接專教推出多項措施，包括：建議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及事業探索活動，推行「商校合作計劃」為學生未來升學與就業提供多元化選擇。教育政策亦有顧及新來港青年和非華語青年，提供教育及支援服務，當中包括適應課程、校本支援計畫津貼、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等，協助他們克服學習中文的困難，盡早融入本地社會（教育局，2019b），支援政策的成效仍需時間驗證。內地新來港和非華語高中生升讀專教的機會仍低於主流學生（政府統計處，2017），被評為教育制度不公的結果（香港融樂會，2015；Chu, 2019）。英語水平不達標是內地新來港和低收入家庭學生面對的普遍升讀專教的封頂因素。反之，中文語文能力不足、家境及經濟困難等則是非華語學生的

共同障礙（袁月梅，2019; Yuen, 2018; Zhang & Ting, 2011），語言溝通上的障礙亦引致他們在跨文化適應和身分認同上的掙扎（Chee, 2012; Gu & Patkin, 2013），造成精英和非精英學生二元化的情況（Wong, 2014）。

生涯規劃教育雖然可為升學與就業方面提供相關資訊，可惜未能協助學生規劃長遠人生目標（教育局，2019a）。隨着環球和香港社會的急速發展和制度變遷，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常態下，生涯規劃能否令學生做到真正的主自主人生規劃需要時間去引證（〈中大研究〉，2020）。在數碼洪溝效應下，貧窮和社會流動兩者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生涯規劃不足（田方澤，2015）。反之，高中生的生涯規劃需要與專教課程的發展導向作協調性的檢視。

對於一般中下階層學生，經濟支援是升讀專教的重要條件。香港政府為解決基層學生的經濟需要，在不同的教育階段提供不同的資助計畫，其中學生資助處（2020）為中、小學生提供學生資助計畫，包括學校書簿津貼計畫、學生車船津貼計畫和上網津貼計畫。這些計畫一般需要入息審查和評估，津貼金額會按「調整後家庭收入」分為全額和半額，全額津貼約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40%，其審查標準被認為門檻較高（歐陽達初、黃和平，2017），或對於非華語的南亞裔家庭在申請資助計畫時大多數（九成）都會遇到困難（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2016）。直至《2019 年施政報告》，政府開始恆常化向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發放一次性 2,500 元開學津貼。政府資助政策的成效仍有待驗證。

香港主流、內地來港和少數族裔學生的處境

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青年擁有專教資歷的約有 395,079 人，佔整體青年人口的 50.9%（政府統計處，2018b）。數年前的相關研究發現，雖然主流青年對個人自身發展感到樂觀，但部分則對社會未來發展感到悲觀，尤其認為社會競爭風氣盛行、社會向上流動緩慢和對政府管治能力存疑（青年創研庫，2016）。另外，基層青年在升學與就業上亦面對不同障礙，如資助津貼不足、欠缺競爭力、專教機會不均等問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5）。同時，亦不是每位大學畢業生都能晉身中產階級，甚至出現工作收入的下調趨勢。顯然，現今香港青年在客觀分析或主觀層面上均普遍經歷「下游」情況（葉仲茵、趙永佳，2016），此消極情況不斷擴大，形成無力「港產」青年（袁月梅，2019）和主流成弱勢的現象。

以 2016 年計，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的青年有 24,008 人，佔全港青年人口 3.1%（政府統計處，2018b）。當中擁有中學學歷的約有 19,110 人（佔 79.6%），而擁有專教的只有 4,793 人（佔 20%）（政府統計處，2018a）。過往研究發現內地來港學生普遍在貧窮和適應問題上面對最大障礙（袁月梅，2004；Chee, 2012; Yuen, 2018），

其中普通話在校園內被邊緣化為一種外圍語言，令內地來港學生容易被排擠或歧視（Gu, 2011）。此外，內地來港學生的社交網絡和家庭資本亦相對較少，導致他們的生活滿足感和學校參與程度較低（Yuen, 2016）。

而少數族裔青年（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則有 27,651 人（政府統計處，2017），當中南亞裔青年佔 11,231 人（政府統計處，2018b）。在香港，年齡介乎 18–24 歲的主流學生就學率為 51.8%，而南亞和東南亞裔青年只有 29.2%（政府統計處，2017）。再者，教育程度偏低和中文能力遜色是少數族裔在就業和社會融合方面的障礙（政府統計處，2018c）。他們不少是土生土長，能操流利廣東話，但在教育、就業以至日常生活上與主流社會仍有很大的疏離感（袁月梅，2019）。資源不足、語言障礙、文化融合問題、貧窮、歧視和定型等因素，都使他們在教育上較香港主流學生處於劣勢（香港融樂會，2015；羅嘉怡、洪安盈，2020；Shum et al., 2011）。

文獻回顧

影響升讀專教的成功與障礙因素

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與上游機會息息相關。Harris & Halpin (2002) 的「影響升讀專上教育因素」研究以美國低收入的社區學院學生為主，社會資本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又同時採取了綜合模式取向去探討學生升讀專教的不同因素，包括重要他者（親友及師長）的關係、經濟支援及資訊掌握、性別和社會地位等。西方和北美在這方面的研究可作理論框架參考，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文獻理論在不同文化、時代和社會的適切性，例如西方和北美社會對個人種族和資助計畫的因素較重要他者（特別是家人期望）的影響較大，而在華人社會，家人的支持和關懷則非常重要。同時，時代和社會條件的改變亦是專教功能的考驗。香港因專教學額急增，引致學歷貶值、學校階層化和基層學生升讀專教的機會大幅減少等問題（〈觀點與角度：青年上流尚欠什麼？〉，2017）。近年主流學生的上游機會受到窒礙（葉仲茵、趙永佳，2016；Shek, 2020），加上環球經濟因疫情大流行導致經濟下行，令這情況更不樂觀。另外，香港學生人口多元化，除內地來港學生外，少數族裔的南亞和東南亞學生人數激增，他們同是香港社會的棟樑，但升讀專教的機會遠低於主流學生，專教能否為他們帶來上游機會這問題的研究不多，值得探討。為補不足，本研究首先檢視國際文獻（Bowles et al., 2014; Gabi & Sharpe, 2021; Harris & Halpin, 2002）提出影響升讀專教的重要誘因和阻力，繼而分析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作研究架構和調適評量工具的基礎。

重要他者 (significant others)

Harris & Halpin (2002) 認為，家長、家庭成員、朋輩和師生都是學生的導師和參考對象，對他們在教育和職業期許上產生重要的影響 (Wu & Bai, 2015)。前人研究經常忽視了自選重要他者的考量 (Otto, 1977)，因學生的社經背景、性別、種族不同，重要他者對他們升讀專教發生不同的作用 (Cheng & Starks, 2002)，影響學生的學習投入感、教育興趣和選擇 (Gabay-Egozi et al., 2015; Holland, 2011; Sjaastad, 2012)。香港是華人社會，父母和師友對學生升學選擇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經濟支援方面起了很大的影響。然而，隨着社會變遷和家庭觀念轉移，近年香港的家長（特別是中產以上的家長）傾向以信任和鼓勵的態度去支持子女升讀專教的選擇；但對於社經地位低或族群性強，或有較強意念和決心藉教育去突破跨代貧窮的學生，更尊重父母對自己升學的意願。為了引證此點，本研究比較不同族裔群體對影響他們的親友的評估。

封頂效應 (glass ceiling effect)

這是指限制個人向上流動的障礙因素，源於 20 世紀 80 年代對少數族裔和女性在專教或職場上所遇到不平等對待的描述，當年深膚色女性和少數族裔在升讀專教和就業機會方面受到不公平對待，形成封頂效應 (Jackson et al., 2014)。前人研究和數據發現，性別、種族、文化和家庭背景等往往是影響升學和就業升遷的重要因素 (Cooper, 2019; Mullen, 2011; Thompson & McDonald, 2016)。今天，封頂效應是量度高中生升讀專教一項重要的障礙因素。Harris & Halpin (2002) 更認為強烈的封頂效應可令一些邊緣群體在升讀專教或職場競爭上因不利條件而失去鬥志甚或希望。正如上文提及，內地來港和少數族裔學生在港升讀專教的機會不及主流學生，這與他們的學校經驗、老師期望 (香港融樂會, 2015) 和語文學習表現及適應相關，故此本研究嘗試比較不同學生群體面對的障礙，以及不同因素間的互動關係，尋找更多實證以作政策研究的參考，作出針對性的支援，喚起社會對弱勢青年升讀專教的關顧，為平等高等教育貢獻綿力。

專教功能 (relative functionalism)

這是指學生自覺接受專教和沒有接受專教的差異 (Harris & Halpin, 2002)。Sue & Okazaki (2009) 認為在非教育領域為畢業生提供的流動機會少，更顯示專教是青年上游的關鍵。在教育市場化愈趨嚴重的情況下，學生更希望從教育上得到更多價值，而學生對專教的價值亦有不同的理解 (Woodall et al., 2014)。Scharf et al. (2019) 指出教育價值可分為物質得益和非物質得益，過往研究主要採用理性選擇理論評價升讀

專教的成本和物質得益，更視上游為專教的主要功能，而忽視專教所帶來的非物質得益，如身心福祉和人際社交等。

掌控感 (locus of control)

這是指個人認為自己能夠掌控事件和行為的感覺，可分為外控者和內控者兩類：外控者相信個人行為或事情是受制於不能控制的外在因素，如幸運、命運或有強大影響力的人；而內控者則相信他們的行為和結果是他們自己掌控的 (Lefcourt, 1982; Rotter, 1966)。多項研究發現內控者比外控者更能升讀專教或在職場上取得成功 (Albert & Dahling, 2016; Harris & Halpin, 2002; Piatek & Pinger, 2010)。

自我信念 (self-belief)

這是指個人對達成個人目標的信心。Pajares & Schunk (2002) 指出自我信念可分為自我效能和自我概念的信念：自我效能信念指個人對自己能力的自我判斷，並充分相信自己可以完成某事的信念 (Bandura, 1986)；而自我概念則是一種自我描述的信念，通過自我反思評估自身能力和自我價值 (D'Amico et al., 2006)。前人研究發現自我信念是一項升讀專教和計畫職業發展的重要預測指標，例如學術成就 (Komarraju & Nadler, 2013)、自我調節 (Lee et al., 2014) 和職業計畫 (Fenning & May, 2013) 等。學生對升讀專教的自我信念強，則有助他們逆境自強、迎難而上。本研究將會測試其影響力，及其跟其他因素之間是否存在緩和關係。

升讀專教準備 (preparation for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離校準備非常重要，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相關資訊和獲得專業指導，家長、師長和不同持份者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John et al., 2018)，學校要提升學生學術能力應付大專入學試，並提供多元化支援政策和措施，如邀請舊生分享成功經驗、參觀大專院校、舉辦離校出路講座等，增強學生對離校生活的信心和誘發升讀專教的期許等。Harris & Halpin (2002) 指出在專教準備上，不少學生（特別是低社經地位的學生）未能掌握升讀專教的重要資訊，生涯規劃的輔導老師在這方面能發揮重要角色，而學生資助計畫更可提供升讀專教的重要資訊。

資助認知及需要 (financial aid)

升學資助是升讀專教的重要條件之一，欠缺資助認知或升學資助成為弱勢學生群體面對的升學障礙 (Harris & Halpin, 2002)。有研究發現，資助對中等或高收入

學生提升高等教育的參與有正面的影響，亦能幫助負擔不起學費的低收入學生繼續升學（John et al., 2018）。Wu & Bai（2015）發現低學費不僅能令更多學生跨越經濟負擔，亦能消除因經濟地位導致對升讀專教期許的差異。在香港，家境較優勝的家長一般都樂意支持子女專教的學費，但學生仍需支付個人生活費，故此大專生兼職是常態。然而對於家境貧困的新移民、少數族裔學生，兼職是應付個人開支甚或分擔家人經濟的途徑，某程度上升讀專教反而是他們的奢侈品。解決學生的經濟困難，各項專教資助均可成為高中生升讀專教的誘因，亦是本研究探討的項目之一。總括而言，上述各因素與升讀專教息息相關，而它們之間的交互關係則需要進一步探討。

研究目的及問題

基於東西方社會文化和教育制度、學生族群的社經地位和價值觀、學校因素等，探討專教功能和相關的問題必須作本土化的分析。為此，本研究探討和比較影響香港主流、內地來港和少數族裔高中生升讀專教的因素，包括所得支援，要面對的語言、經濟困難，以及個人對專教功能和自我信念等的自評。主要的研究問題為：（1）香港主流學生、內地新來港和少數族裔（南亞／東南亞學生）群組在升讀專教所面對的成功和障礙因素有何異同？原因何在？（2）所得研究數據對相關的政府政策和高中教育有何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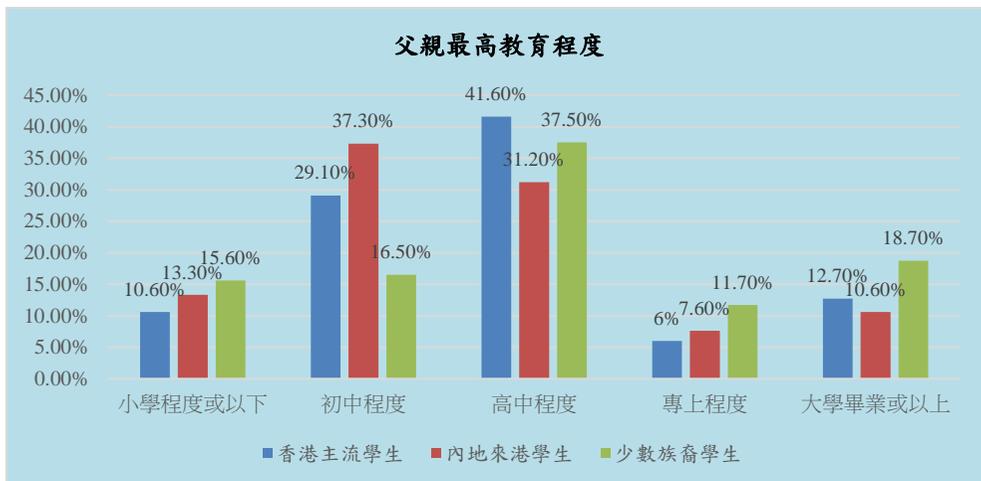
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和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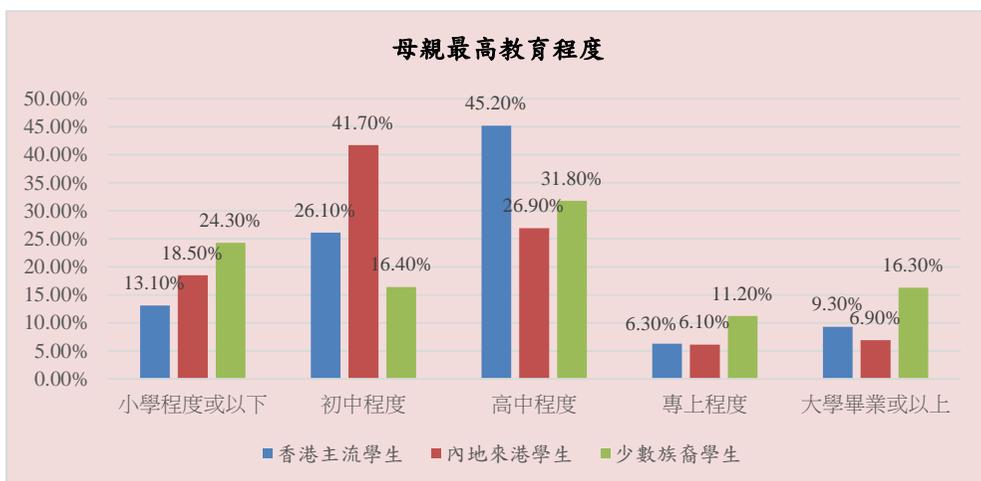
為了獲得具代表性和深入的資料，研究以問卷調查和訪談（追蹤及聚焦訪談）等混合模式進行，互補兩者之間的限制（Creswell & Creswell, 2018; Yin, 2018）。為了深入分析量化數據，本文集中討論量化結果。問卷調查以分層抽樣方法，按學校的主流和非主流學生群體比例邀請，於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期間收集了5,014份來自23所中學、中四至中六學生的有效問卷，成功率約八成。大部分（17所）學校為資助中學，其餘6所為直資或官立中學。有10所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為免標籤學校類別，教育局不設正規的學生能力分類。樣本數據方面，男女分別為2,436人和2,474人〔按；遺失資料104〕；中四有1,782人（35.5%），中五有1,788人（35.7%），中六有1,444人（28.8%）；學生群體分布方面，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有1,945人（45%），香港主流資助（書簿津貼）學生有1,087人（25%），內地來港學生（少於7年）有603人（14%），少數族裔學生有692人（16%）〔按；遺失資料687〕，當中主流資助與非資助學生居多，少數族裔學生的組成則以南亞和東南亞族裔學生為主。學生

家庭背景方面，約兩成父親從事體力勞動工作（23%），兩成母親從事服務和銷售工作（20%）。父母大部分僅有中學程度或以下（見圖一和圖二）。

圖一：各學生群組父親最高的教育程度



圖二：各學生群組母親最高的教育程度



變項的測量和數據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影響升讀專教的因素，按香港社會情況調適了 Harris & Halpin（2002）的問卷，先導測試後再修訂問卷，整合出七項影響升讀專教的成和障礙因素，當中重要他者共設 4 個選項，自評分 1 為從不、4 為時常；封頂效應、專教功能和自我信念各設 4 個選項，自評分 1 為非常不同意、4 為非常同意；資助認知及

需要設二元選項，自評分 1 為是、0 為否。修訂的問卷工具以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再進行聚合效度和區別效度測試。本文運用 One-way MANOVA 比較七項因素對四組學生群體升讀專教的影響差異；又以 One-way ANOVA 進行項目檢驗 (item analysis)，深入了解各項目對各群體影響的分別。

研究結果

學生群體之間成功與障礙因素的差異

縱觀而言，少數族裔學生在七項成功和障礙因素的自評平均分均高於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亦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 ($p < .05$) (表一)，反映少數族裔學生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更重視升讀專教或獲得更多重要他者 (父母、師長、同儕等) 的幫助和升讀專教準備支援；在掌控感、自我信念、專教功能等項的評分亦較高。在封頂障礙和資助認知及需要方面，少數族裔學生同時給予較高的評分，顯示他們比主流非資助學生面對更大的挑戰或處於不利的社會地位。

對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內地來港學生除在掌控感和升讀專教準備兩項沒有顯著差異外，在重要他者、封頂效應、專教功能、自我信念、資助認知及需要等項的自評平均分稍高。反之，香港主流資助學生對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只有在封頂效應和資助認知及需要的自評平均分稍高。當中，三個群體在封頂效應和資助認知及需要的自評分都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高並有顯著差異，表示三個群體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都自覺在升讀專教面對較多障礙，尤其是少數族裔學生面對的障礙更多。

表一：不同學生群體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在影響升讀專教的因素 (One-way MANOVA)

| 參照組：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 重要 他者 | 封頂 效應 | 專教 功能 | 掌控 感 | 自我 信念 | 升讀 專教 準備 | 資助認知 及需要 |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平均差 | -.04 | .11* | .04 | .01 | -.01 | .00 | .17* |
| | 效應值 | -0.06 | 0.20 | 0.08 | 0.02 | -0.02 | 0.01 | 0.28 |
| 內地來港學生 | 平均差 | .10* | .15* | .12* | .05 | .11* | .04 | .13* |
| | 效應值 | 0.13 | 0.27 | 0.23 | 0.09 | 0.19 | 0.12 | 0.21 |
| 少數族裔學生 | 平均差 | .23* | .42* | .22* | .09* | .39* | .06* | .33* |
| | 效應值 | 0.33 | 0.72 | 0.41 | 0.16 | 0.65 | 0.19 | 0.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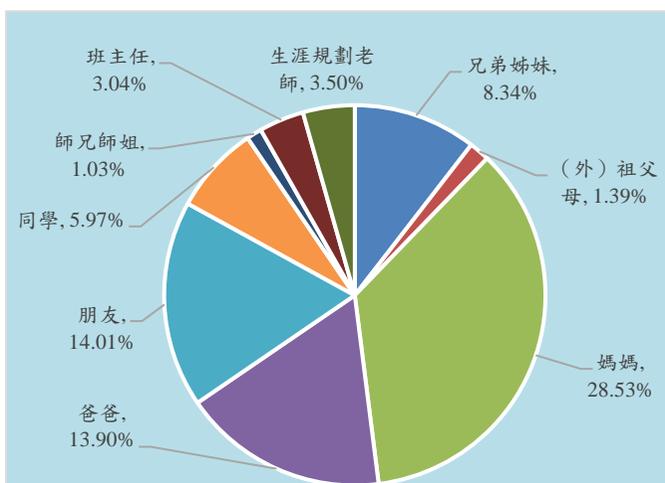
* $p < .05$ ，調整了 p 值以進行多次比較 (Bonferroni 校正)。

- 註： 1. 封頂效應，分數愈高，升讀專教障礙愈大；
2. 升讀專教準備，項目是二分法 (0 = 沒有，1 =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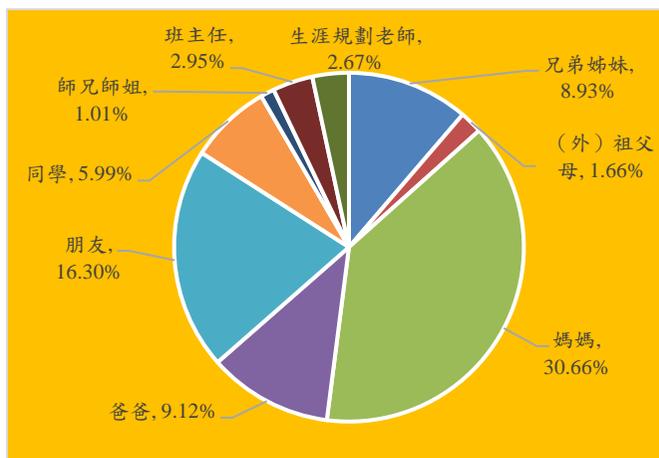
不同學生群體對重要他者的看法和差異

重要他者方面，四組學生群體均認為母親對他們升讀專教影響最大，其次是朋友和爸爸（見圖三至圖六）。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文獻中老師被視為重要的影響人物（Cheng & Starks, 2002; Harris & Halpin, 2002），但本研究中只有不足一成的學生樣本選取此項。當中，四個群體均認同重要他者（父母親／朋友）的影響程度，分別是鼓勵他們報讀專教（ $M = 3-3.43$ ），其次是與他們討論中學畢業後的計畫（ $M = 2.87-3.03$ ）和強調專教的重要性（ $M = 2.86-3.08$ ），而重要他者在告訴他們就讀專上學院／大學的挑戰相對較少（ $M = 2.52-2.8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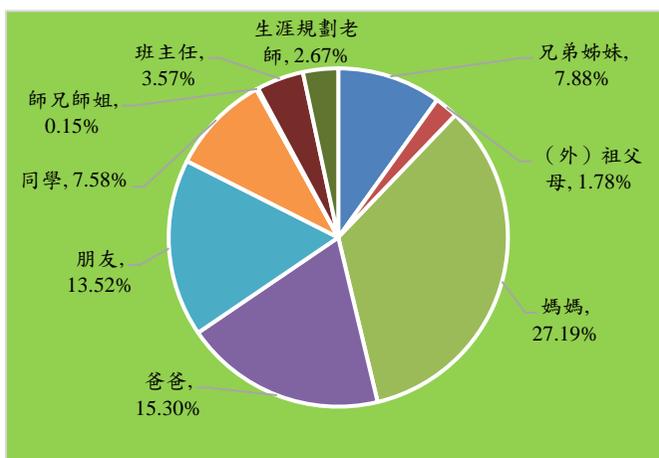
圖三：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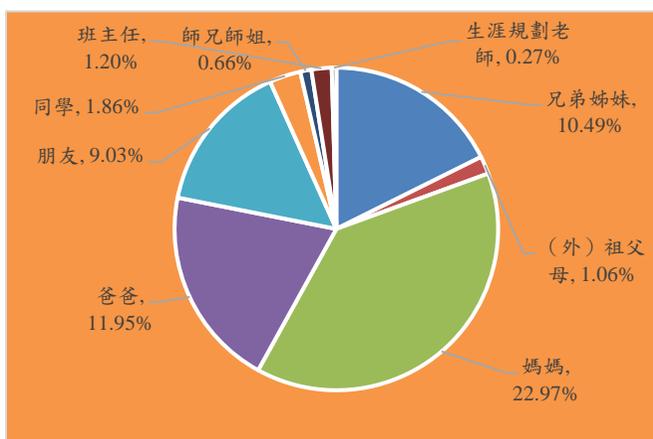
圖四：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圖五：內地來港學生



圖六：少數族裔學生



與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相比（見表二），少數族裔學生在各項支援中都表明從重要他者身上獲得更多幫助，尤其是鼓勵他們升學和告訴他們升讀專教的挑戰兩方面；而內地來港學生在強調專教的重要性和告訴他們升讀專教的挑戰上亦顯著獲得重要他者更多的幫助；香港主流資助學生則在各項上沒有顯著差異。

封頂效應對不同學生群體的影響

在封頂效應中，四組學生的家庭背景($M = 2.05-2.51$)、經濟狀況($M = 2.40-2.69$)、

表二：不同學生群體對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在重要他者的項目平均差（One-way ANOVA）

| 他／她 | 參照組：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 | | | |
|-----------------|---------------|-------|-------------|-------|-------------|------|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 內地來港學生 | | 少數族裔學生 | |
|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 會和我討論中學畢業後的計畫 | -.05 | -0.06 | -.03 | -0.03 | .11* | 0.13 |
| 鼓勵我報讀專上學院／大學 | -.04 | -0.04 | .07 | 0.08 | .40* | 0.45 |
| 強調專上學院／大學教育的重要性 | -.03 | -0.03 | .19* | 0.20 | .11* | 0.12 |
| 告訴我讀專上學院／大學的挑戰 | -.06 | -0.06 | .15* | 0.16 | .32* | 0.35 |

* $p < .05$ ，調整了 p 值以進行多次比較（Bonferroni 校正）。

註：效應值 = 平均差／合併標準差；Cohen's 經驗法則，0.2（小程度效應值），0.5（中程度效應值），0.8（大程度效應值）。

語言能力（ $M = 2.56-2.81$ ）、缺乏專家建議和指導（ $M = 2.32-2.54$ ）是他們面對升讀專教的障礙，而少數族裔學生更認為種族文化（ $M = 2.46$ ）和社會對性別的期望（ $M = 2.25$ ）是他們在專教路上面對的障礙。整體而言，語言能力對四組學生的封頂影響最大（ $M = 2.62$ ），其次是經濟狀況（ $M = 2.53$ ）。

表三顯示了不同學生群體與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對比的平均差，少數族裔學生在各項障礙因素上有顯著較高且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以種族文化上的影響最為顯著，家庭背景和社會對性別的期望次之；除語言能力外，內地來港學生則在各項障礙因素都顯著高於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以家庭背景和種族文化最顯著；但香港主流資助學生在家庭背景、經濟狀況、語言能力、缺乏專家建議和指導方面卻顯著高於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特別是家庭背景和經濟狀況。

表三：不同學生群體對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在封頂效應的項目平均差（One-way ANOVA）

| 障礙因素 | 參照組：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 | | | |
|-----------|---------------|------|-------------|------|-------------|------|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 內地來港學生 | | 少數族裔學生 | |
|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 家庭背景 | .21* | 0.26 | .24* | 0.30 | .46* | 0.55 |
| 種族文化 | .03 | 0.05 | .22* | 0.29 | .81* | 1.05 |
| 經濟狀況 | .27* | 0.32 | .14* | 0.16 | .30* | 0.34 |
| 自己的語言能力 | .10* | 0.11 | .07 | 0.08 | .24* | 0.28 |
| 缺乏專家建議和指導 | .10* | 0.12 | .15* | 0.19 | .22* | 0.27 |
| 社會對性別的期望 | .00 | 0.00 | .11* | 0.14 | .41* | 0.51 |

* $p < .05$ ，調整了 p 值以進行多次比較（Bonferroni 校正）。

註：效應值 = 平均差／合併標準差；Cohen's 經驗法則，0.2（小程度效應值），0.5（中程度效應值），0.8（大程度效應值）；封頂效應，分數愈高，升讀專上教育障礙愈大。

不同學生群體對專教功能的看法和差異

專教功能方面，各學生群體均認同專教學歷能使他們更容易找到工作（ $M = 3.21-3.36$ ）、改善生活水準（ $M = 3.16-3.36$ ）、提高社經地位（ $M = 3.05-3.28$ ）、提升自尊心（ $M = 3.01-3.19$ ）、放眼世界（ $M = 3.08-3.27$ ）、使家人快樂（ $M = 2.16-3.54$ ）。整體而言，學生認為專教資歷在使他們容易找到工作（ $M = 3.24$ ）和使家人快樂（ $M = 3.24$ ）的功能最大，對提升他們的自尊心則最少（ $M = 3.06$ ）。

表四顯示了不同學生群體與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在各項專教功能的平均差。結果發現，兩組本地主流學生的自評相約，並沒有顯著差異。兩組非主流學生則大致在各個正負因素的項目評分上，都顯著高於本地主流非資助學生，除了內地來港學生對於專教更容易找到工作上沒有顯著差異。非主流學生尤其認同專上學歷可以提高社經地位和增廣見聞；少數族裔學生最認同專教是可以使家人快樂的最大功能。

表四：不同群組對專教功能的項目平均差（One-way ANOVA）

| 獲得專上學院／大學 資歷，可以使我…… | 參照組：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 | | | |
|------------------------|---------------|------|-------------|------|-------------|------|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 內地來港學生 | | 少數族裔學生 | |
|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 更容易找到工作 | .02 | 0.03 | .07 | 0.10 | .16* | 0.23 |
| 改善生活水準 | .04 | 0.06 | .13* | 0.18 | .20* | 0.28 |
| 提高社經地位 | .06 | 0.08 | .15* | 0.20 | .24* | 0.33 |
| 提升自尊心 | .02 | 0.03 | .13* | 0.18 | .18* | 0.26 |
| 放眼世界 | .04 | 0.06 | .20* | 0.27 | .20* | 0.27 |
| 使家人快樂 | .06 | 0.08 | .11* | 0.16 | .39* | 0.55 |

* $p < .05$ ，調整了 p 值以進行多次比較（Bonferroni 校正）。

註：效應值 = 平均差／合併標準差；Cohen's 經驗法則，0.2（小程度效應值），0.5（中程度效應值），0.8（大程度效應值）。

自我信念於不同群體的差異

各學生群體在自我信念方面，稍為認同自己現時的表現並認為自己未來在學業和職業道路上能取得成功。當中，各學生群體分別認為可以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取得成功的平均分最高（ $M = 2.74-3.04$ ），其次是可以在未來的專教裏取得成功（ $M = 2.63-2.93$ ）和取得好成績（ $M = 2.58-2.64$ ），而認為自己是一名優秀的高中生則相對較低（ $M = 2.40-3.01$ ）。不同學生群體與香港非主流資助學生相比（見表五），非主流學生不論對現時身為高中生的表現或是未來在升學和職場上都有較高的自我信念，能取得成功和有優秀表現，少數族裔學生在各項自我信念更有信心。反之，不論是主流或非主流領取書簿津貼的學生，在自我信念上並沒有明顯分別。

表五：不同群組對自我信念的項目平均差（One-way ANOVA）

| 我認為…… | 參照組：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 | | | |
|--------------------------------|---------------|-------|-------------|------|-------------|------|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 內地來港學生 | | 少數族裔學生 | |
|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 我是一名優秀的高中生 | .01 | 0.01 | .20* | 0.25 | .60* | 0.80 |
| 我可以在我未來的專上學院／ 大學主科（專業）裏取得成功 | -.02 | -0.02 | .09* | 0.13 | .30* | 0.43 |
| 我可以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取得 成功 | -.01 | -0.02 | .08* | 0.12 | .30* | 0.44 |
| 我可以在專上學院／大學裏取得 好成績 | -.02 | -0.02 | .11* | 0.16 | .36* | 0.52 |

* $p < .05$ ，調整了 p 值以進行多次比較（Bonferroni 校正）。

註：效應值 = 平均差／合併標準差；Cohen's 經驗法則，0.2（小程度效應值），0.5（中程度效應值），0.8（大程度效應值）。

資助認知及需要

資助認知及需要方面，所有群體對需要申請經濟援助都給予最高分（ $M = 2.46-2.86$ ），反而對清楚不同院校的資助計畫（ $M = 2.28-2.54$ ）和申請經濟援助的途徑（ $M = 2.17-2.53$ ）上相對較弱。對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其他三個群體在「經濟援助」一項的自評分顯著較高，表明資助是重要的升讀專教條件。另外，香港主流資助學生和少數族裔學生較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更清楚申請資助計畫的途徑，而少數族裔學生更相對清楚不同院校的資助計畫，這可能反映經濟支援是他們考慮升讀專教的重要因素，促使他們更關注相關支援。雖然內地來港學生的社經地位不高，但他們在資助認知及需要的評分與主流非資助學生卻沒有明顯差別，這點有些意外，或許與他們對自己問題自己解決的想法相關，比較傾向以個人或其他途徑解決經濟問題（見表六）。

表六：不同學生群體對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在資助計畫的認知及需要的項目平均差（One-way ANOVA）

| | 參照組：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 | | | |
|---------------------------------|---------------|------|-------------|------|-------------|------|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 內地來港學生 | | 少數族裔學生 | |
|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平均差 | 效應值 |
| 我清楚不同的專上學院／大學的 資助計畫 | .03 | 0.04 | .08 | 0.10 | .26* | 0.32 |
| 我知道申請經濟援助計畫的途徑 | .10* | 0.13 | .05 | 0.07 | .35* | 0.46 |
| 我報讀專上學院／大學很可能需 要向政府借貸或申請經濟援助 | .39* | 0.47 | .28* | 0.33 | .40* | 0.47 |

* $p < .05$ ，調整了 p 值以進行多次比較（Bonferroni 校正）。

註：效應值 = 平均差／合併標準差；Cohen's 經驗法則，0.2（小程度效應值），0.5（中程度效應值），0.8（大程度效應值）。

為了進一步檢視成功和障礙因素對自我信念是否存有緩和效應，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型（無約束方法）（Marsh et al., 2004）進行了 46 次緩和效應分析（moderation analysis），發現學生群體在以下兩項均對自我信念產生緩和效應：不同程度的資助認知及需要方面和封頂效應（見表七）。一般而言，封頂效應對自我信念存在負相關係數，意味着封頂效應愈高障礙愈大，自我信念和自信心等方面亦會較低。結果發現封頂效應對香港主流和少數族裔學生的自我信念有較大及顯著的影響，以低程度資助認知及需要組群最明顯，中程度資助認知及需要組群次之。惟在內地來港學生中未有發現相關的顯著影響。

表七：不同程度的資助認知及需要和封頂效應對自我信念的影響（moderation analysis）

| 資助認程度 | 低 | 中 | 高 |
|-----------|------------------|------------------|----------------|
| 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 | $\beta = -.26^*$ | $\beta = -.16^*$ | $\beta = -.05$ |
| 香港主流資助學生 | $\beta = -.28^*$ | $\beta = -.15^*$ | $\beta = -.02$ |
| 少數族裔學生 | $\beta = -.13^*$ | $\beta = -.05$ | $\beta = .03$ |

討論和總結

本研究分析了升讀專教的成功和障礙因素，結果發現香港非主流學生比主流學生在成功因素上自評更有優勢及正面，當中重要他者、專教功能和自我信念的自評分差異比掌控感和升讀專教準備更為明顯；至於障礙因素（如封頂效應和資助認知及需要），香港主流資助學生及非主流學生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更為嚴峻。以下將討論其成功和障礙因素差異的原因。

成功因素：重要他者、專教功能、自我信念

學者（Holland, 2011; Sjaastad, 2012）認為，重要他者為學生帶來不同的鼓勵、支援和榜樣，例如父母在教育 and 就業選擇上，朋友在教育計畫和學習經驗上，而老師則對學生參與和學習動機方面產生較大的影響。本研究發現香港高中生心目中的最重要成員多為父母和朋友，只有不足一成認為老師和生涯規劃老師是重要成員，反映亞洲人更重視家庭關係和肯定家長在子女升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與西方的情況不同（Harris & Halpin, 2002）。同時，有別於國際文獻視老師為重要他者，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香港老師對高中生升讀專教的影響力不明顯，這或會影響老師在推廣生涯規劃教育和幫助學生規劃長遠人生目標的成效。此外，由於不少內地來港和少數族裔學生均在社會和校園被邊緣化（袁月梅, 2019; 羅嘉怡、洪安盈, 2020），重要他者

對非主流學生的鼓勵和幫助變得更为重要，尤其不少父母希望透過教育改善他們在社會的劣勢。

重要他者對非主流學生的影響在專教功能上亦反映一二。香港非主流學生對比主流非資助學生更相信專教功能可以提升他們上游的機會，這或許與他們父母的學歷和家庭工作背景有關（何瑞珠等，2017）。相比專教功能帶來的物質得益，非主流學生更認為從專教上能獲得更多非物質得益，例如提升自尊心、放眼世界、使家人快樂等。雖然新來港和少數族裔學生肯定專教的功能，認為親友師長和朋友給予他們很大幫助，但他們入讀大專的人數只有約三成或以下，實需要增加機會和提升他們對專教的合理信心和學業成績。反之，數據反映主流學生對專教功能的態度較非主流學生消極，或許他們對將來抱有較高期望，但現實卻相違背，大專學歷不足以促進上游的期許，同時在環球經濟下行和資歷通脹的社會現實及主觀感受上，高中生對前景都充滿困惑和不安（葉仲茵、趙永佳，2016），他們的生活滿足感反比非主流學生低（Yuen, 2016; Yuen et al., 2016）。在增加他們學術能力的同時，高中教育亦需強化他們的期望管理能力，在肯定個人潛能外，還要學懂應變包容、開拓視野，把握多元發展和長遠的向上流動機會，遇到困難時能保持樂觀態度。

與傳統看法有別，香港非主流學生較主流非資助學生在自我信念方面更正面，對自己在學業和職業上取得成功展示信心，反映他們的樂觀文化和價值觀。少數族裔學生（尤其是南亞和東南亞學生）大多受家庭宗教背景影響，較關注靈性健康，對生活滿足感較華裔學生高和較易知足（袁月梅，2019；Yuen et al., 2016）。另外，內地來港和少數族裔學生的社交圈子主要是同族同語的群體，學校社區活動可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加強他們與主流社會的連結，增加他們的社會資本，亦可使他們對專教制度和成人生活有更深入和全面的認知，達至更理想的自我效能和信念。

本研究於 2019 年發生的香港社會事件之前進行，數據展示出香港主流和非主流學生群體對專教觀感的差異，前者的自我信念反而不及後者強，反映在香港新高中下，主流學生對自己競爭條件和優勢產生疑惑的情況一直存在（呂大樂，2015）；經歷 2019 年的社會事件和其後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驗後，香港青少年面對價值觀的衝擊和身心靈的創傷（Shek, 2020），對將來缺乏信心和動力的情況日趨嚴重。高中教育課程需要平衡應試和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正確人生觀、抗逆力和視野。

本研究亦引證了家庭背景、經濟狀況和語文能力是高中生升讀專教的共同封頂障礙。香港弱勢學生的情況與國際社會相似，縱使教育普及化和扶貧措施多元化，階級和社經地位仍是窒礙他們通往專教和上游的機會（Mullen, 2011），措施未能有效打破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對社會階層和再造的循環（Bourdieu & Passeron, 1990）。對於少數族裔學生，經濟、語言和種族不平等是他們面對的障礙，數據亦引證香港教育制度欠缺有效的政策回應他們升讀專教的多元需要（Yuen et al., 2016）；性別

定型是另一障礙，與他們「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觀念或信仰傳統相關（袁月梅，2019; Yuen, 2016）。家長期望是他們升讀專教的動力，高中的生涯規劃和家長教育需要緊密合作，既可強化專業意見，鼓勵他們對升學有合理的期望並及早準備，又能增加他們畢業後的上游機會，打破隔代貧窮的宿命。另外，對內地來港學生來說，家境和社會兼容氛圍都影響他們升讀專教，故此經濟支援和推廣地域融和的政策是協助他們成功的誘因。

在資助方面，香港弱勢學生更有申請經濟援助的需要，以減輕他們學費的負擔，消除因經濟狀況而阻礙升讀專教的情況，這與國際狀況相符（John et al., 2018; Wu & Bai, 2015）。雖然政府設有多項經濟支援政策協助學生在不同教育階段的升學開支，但支援金額或貸款或未能完全幫助弱勢學生，尤其少數族裔學生在申請資助過程上遇到不少困難（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2016）。這與本研究發現少數族裔學生比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更清楚不同的資助計畫及其申請途徑，原因可能是香港主流非資助學生因沒有迫切經濟援助需要或未能符合審查標準，而沒有主動了解或查找相關資訊。然而，研究結果反映香港主流學生比非主流學生同樣面對不少升學障礙，但他們獲得的支援和信心比非主流學生更少。不論是香港主流學生還是非主流學生，他們都是社會未來的棟樑，社會有責任協助他們實踐人生抱負，預防出現主流成弱勢和教育不平等的社會現象。

政策銜接和建議

基於上述實證研究，我們提出透過更多元平等的青年發展政策，為香港主流學生提供多元化的上游途徑，突破封頂障礙。具體建議如下：（1）增加大專資歷和進入勞動市場的短中長期流動性，提升畢業生素質，增加上游機會；（2）擴闊高中生的入脈網絡，善用家長資源和互助網絡，透過師生計畫和校友計畫，協助離校生過渡至專教或就業；（3）設生涯規劃和職業教育為核心課程，與香港、內地和東南亞工商界合作，提供實習機會，為成人生活作更好準備；（4）關注價值教育和身心靈健康教育，提升個人的規劃能力，確立正向積極的價值觀和期望管理，迎接急速轉變的社會和時代，找到前進的理想和意志；（5）增加非主流群體的社會和文化資本，連結新來港和南亞／東南亞社群組織，推廣社會融和的互助風氣，確立資助專教誘因；（6）設多語言教育資訊途徑，增加南亞／東南亞學生及家長對專教和職業教育及資助方法的認識；大專院校可考慮以替代中文資格（例如 IGCSE 中文）為入學條件，減低中文障礙；（7）增強內地來港學生的學習掌控感和對本地社會的歸屬感，建立資助的英語學習中心。最後，儘管羅馬非一日能建成，但系統化的數據可以協助政策的修訂並提供針對性的措施，盡早為高中生升讀專教和上游的問題作出回應。

鳴謝

作者感謝香港優配研究金對本研究的資助（GRF Ref. No. : 18606717）和參與是次研究的學校和學生的參與；還要感謝研究團隊助理梁劍雄博士和庄佳先生。

參考文獻

- 〈中大研究：本地高中生對升讀專上教育持較消極態度〉（2020，12月2日）。《明報》。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201202/s00001/1606905972457/> 中大研究 - 本地高中生對升讀專上教育持較消極態度
-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勞工牧民中心（2016）。《2015/16 學年南亞家庭獲取「中、小學生資助計劃」資訊調查》。https://dpcwklh.hkcccla.org.hk/document/I08_08.pdf
- 田方澤（2015，10月27日）。〈「生涯規劃」的幾點思考（上）——另一套政治工具〉。《獨立媒體》。<https://www.inmediahk.net/教育/「生涯規劃」的幾點思考（上）——另一套政治工具>
- 立法會秘書處（2020，7月8日）。〈數據透視：對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33-educational-support-for-non-chinese-speaking-students-20200708-c.pdf>
- 何瑞珠、黃善國、姜培芝、岑國榮（2017）。〈從 PISA 剖析香港青少年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教育學報》，第45卷第1期，頁47-69。
- 呂大樂（2015，1月9日）。〈回應「中國機會」的兩類意見〉。《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150109/s00012/1420739977777/呂大樂-回應「中國機會」的兩類意見>
- 青年創研庫（2016）。《年輕一代為何出現悲觀情緒》。香港青年協會。
- 政府統計處（2017）。《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https://www.byc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 政府統計處（2018a）。《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01/att/B11201012016XXXXB0100.pdf
- 政府統計處（2018b）。《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04/att/B11201042016XXXXB0100.pdf
- 政府統計處（2018c）。《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9XX0004/att/B9XX0004C2016XXXXC0100.pdf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5）。《基層青少年升學及就業培訓需要研究報告》。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14/10/youth-employment-survey_2015_12_20.pdf
- 香港特別行政區（2020）。《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0/chi/policy.html>

- 香港融樂會 (2015)。《探討香港非華語學生於本地就讀專上教育機會的研究報告》。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0-11/R201508_Post_Secondary_Report.pdf
- 袁月梅 (編) (2004)。《新來港學生教育之研究與發展》。師大書苑。
- 袁月梅 (2019)。《漂流少年——香港學生的快樂與哀愁》。突破出版社。
- 教育局 (2017)。《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教育局。
- 教育局 (2019a)。《生涯規劃教育的推行情況》。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教育局 (2019b)。《新來港兒童教育及支援服務》。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ewly-arrived-children/about-newly-arrived-children/index.html>
- 葉仲茵、趙永佳 (2016)。〈「下流」青年？客觀狀況與主觀感受〉。載趙永佳、葉仲茵、李鏗 (編)，《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 (頁 54–67)。中華書局。
- 歐陽達初、黃和平 (2017)。《未完成的香港社會保障：批判的導論》。中華書局。
- 學生資助處 (2020)。〈中、小學生資助計劃〉。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overview.htm>
- 羅嘉怡、洪安盈 (2020)。〈香港主流學校教育少數族裔學生所面對的挑戰之研究〉。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researchreport_20200115_c.pdf
- 〈觀點與角度：青年上游 尚欠什麼？〉 (2017, 12 月 7 日)。《明報》。 <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article?issue=20171207&nodeid=1512584861121>
- Albert, M. A., & Dahling, J. J. (2016).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and locus of control interact to predict academic self-concep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7, 245–24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6.03.074>
- Bandura, A. (1986).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efficacy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359–373. <https://doi.org/10.1521/jscp.1986.4.3.359>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 Sage.
- Bowles, A., Fisher, R., McPhail, R., Rosenstreich, D., and Dobson, A. (2014). Staying the distanc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enablers of transi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3(2), 212–225. <https://doi.org/10.1080/07294360.2013.832157>
- Chee, W. C. (2012). Envisioned belon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thnicities in Hong Kong schooling. *Asian Anthropology*, 11(1), 89–105. <https://doi.org/10.1080/1683478X.2012.10600858>
- Cheng, S., & Starks, B. (2002).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4), 306–327. <https://doi.org/10.2307/3090281>
- Chu, R. (2019). *Hong Kong's education gap hurts ethnic minorities as much as society at large*. <https://hongkongfp.com/2019/10/08/hong-kongs-education-gap-hurts-ethnic-minorities-much-society-large/>

- Cooper, O. (2019). Where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gression for female students and academic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23(2–3), 93–100. <https://doi.org/10.1080/13603108.2018.1544176>
- Creswell, J. W., & Creswell, D. J. (2018).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5th ed.). Sage.
- D’Amico, A., Carmeci, F., & Cardaci, M. (2006). The self-concept beliefs: Self-referential and compar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 In A. P. Prescott (Ed.), *The concept of self in education, family and sports* (pp. 179–189). Nova Science.
- Fenning, B. E., & May, L. N. (2013).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n A”: Examining the roles of self-efficacy and self-concept in college students’ curr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career planning.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6(4), 635–650. <https://doi.org/10.1007/s11218-013-9228-4>
- Gabay-Egozi, L., Shavit, Y., & Yaish, M.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fields of study: The role of significant others and rational choice motiv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3), 284–297. <https://doi.org/10.1093/esr/jcu090>
- Gabi, J., & Sharpe, S. (2021). Against the odds: An investigation into student persistence in UK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6(2), 198–214.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19.1626364>
- Gu, M. M. (2011). “I am not qualified to be a Hongkongese because of my accented Cantonese”: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 stud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2(6), 515–529.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1.614350>
- Gu, M. M., & Patkin, J. (2013). Heritage and identity: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from South Asia in Hong Ko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4(2), 131–141. <https://doi.org/10.1016/j.linged.2012.12.008>
- Harris, S. M., & Halpin, G. (200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ursuit of higher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2(1), 79–96.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02062001006>
- Holland, N. E. (2011). The power of peers: Influences 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lanning and experiences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s. *Urban Education*, 46(5), 1029–1055. <https://doi.org/10.1177/0042085911400339>
- Jackson, J. F. L., O’Callaghan, E. M., & Leon, R. A. (2014). *Measuring glass ceiling effects in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ossey-Bass.
- John, E. S. P., Daun-Barnett, N., & Moronski-Chapman, K. M. (2018). College preparation. In E. S. P. John, N. Daun-Barnett, & K. M. Moronski-Chapman,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raming strategies for preparation, access, and college success* (2nd ed., pp. 71–93). Routledge.
- Komaraju, M., & Nadler, D. (2013).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hy do implicit beliefs, goals, and effort regulation matter?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5, 67–72.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13.01.005>

- Lee, W., Lee, M. J., & Bong, M. (2014). Testing interest and self-efficacy as predictors of academic self-regulation and achievement.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9*(2), 86–99. <https://doi.org/10.1016/j.cedpsych.2014.02.002>
- Lefcourt, H. M. (1982). *Locus of control: Current trend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sychology Press.
- Marsh, H. W., Wen, Z. L., & Hau, K. T. (2004). Structured equation models of latent interactions: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estimation strategies and indicator construction. *Psychological Methods, 9*(3), 275–300. <https://doi.org/10.1037/1082-989X.9.3.275>
- Mullen, A. L. (2011). *Degrees of inequality: Culture, class, and gender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tto, L. B. (1977). Girl friends as significant-others: Their influence on young men's career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Sociometry, 40*(3), 287–293. <https://doi.org/10.2307/3033536>
- Pajares, F., & Schunk, D. H. (2002). Self and self-belief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 Aronson (Ed.), *Improv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education* (pp. 3–21). Academic Press.
- Piatek, R., & Pinger, P. (2010). *Maintaining (locus of) contro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locus of control on education decisions and wages* (ZEW —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10-093). <http://dx.doi.org/10.2139/ssrn.1739746>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80*(1), 1–28. <https://doi.org/10.1037/h0092976>
- Scharf, J., Hadjar, A., & Grecu, A. (2019). Applying social production function theory to benefits of schooling: The concept of values of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0*(7), 847–867. <https://doi.org/10.1080/01425692.2019.1604207>
- Shek, D. T. L. (2020). Protests in Hong Kong (2019–2020): A perspective based on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5*(3), 619–635. <https://doi.org/10.1007/s11482-020-09825-2>
- Shum, M. S. K., Gao, F., Tsung, L., & Ki, W. W. (2011). South Asian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 Hong Kong: Motivations 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2*(3), 285–297.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0.539693>
- Sjaastad, J. (2012). Sources of inspiration: The role of significant persons in young people's choice of sci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34*(10), 1615–1636. <https://doi.org/10.1080/09500693.2011.590543>
- Sue, S., & Okazaki, S. (2009). Asian-America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 phenomenon in search of an explanation.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 45–55. <https://doi.org/10.1037/1948-1985.S.1.45>
- Thompson, M. S., & McDonald, S. (2016). Race, skin tone,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9*(1), 91–111. <https://doi.org/10.1177/0731121415580026>

- Wong, R. M. H. (2014).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and school grade level: The case of newly arrived Hong Kong students. *Porta Linguarum*, 21, 37–50. <https://doi.org/10.30827/Digibug.30481>
- Woodall, T., Hiller, A., & Resnick, S. (2014). Making sense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s consumers and the value of the university experience.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9(1), 48–67.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11.648373>
- Wu, C. L., & Bai, H. (2015). From early aspirations to actual attainmen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status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n university pursuit. *Higher Education*, 69(3), 331–344.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4-9778-1>
- Yin, R. K. (2018).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 (6th ed.). Sage.
- Yuen, C. Y. M. (2016). Linking life satisfaction with school engagement of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7, 74–82. <https://doi.org/10.1016/j.ijer.2016.03.003>
- Yuen, C. Y. M. (2018). Chinese immigrant students and cross-bound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 A call for equity through culturally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s. In Y. K. Cha, S. H. Ham, & M. S. Lee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Asia Pacific* (pp. 258–271). Routledge.
- Yuen, C. Y. M., Lee, M. S., & Leung, C. S. S. (2016). Religious belief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Beliefs and Values*, 37(1), 103–113. <https://doi.org/10.1080/13617672.2016.1141533>
- Zhang, K. C., & Ting, C. L. M. (2011). The educ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Hong Ko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upport for Learning*, 26(2), 49–5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04.2011.01477.x>

**The Success and Obstacle Factors in Pursu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ong Kong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Students**

Celeste Yuet-Mui YUEN, Alan Chi-Keung CHEUNG, Cheung-Shing LEUNG,
Hayes Hei-Hang TANG, & Luke Chung-Hei CHAN

Abstract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SE)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ritical vehicle fo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for Hong Kong youth. Access to PSE is tightly linked with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ultural capital of an individual. Hence,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lead to different educational and career pathways and life chances. However, students from affluent families tend to have better upward mobility opportunities than those from underprivileged backgrounds. Different factors will affect different student groups' access to PSE.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empirical studies conducted on this area. In response,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success and obstacle factors affecting access to PSE among the Hong Kong mainstream students, Chinese immigrant students (CIS), and non-Chinese speaking (NCS) ethnic minority (South/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A mixed-method was employed. The survey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5,014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23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between October 2018 and May 2019.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findings reveal that Hong Kong mainstream stude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elative functionalism and glass ceiling factors than their non-mainstream CIS and NCS counterparts. Despite encountering fewer financial and language barriers, Hong Kong mainstream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were less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mise of their PSE credentials. In contrast, NCS students reported a significant level of optimism about PSE's value, and greater concerns about the challenges in overcom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ethnic cultures than their Chinese peers. Both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ssential findin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development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glass ceiling; mainstream student; Chinese immigrant student; ethnic minority student

YUEN, Celeste Yuet-Mui (袁月梅)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UNG, Alan Chi-Keung (張志強)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UNG, Cheung-Shing (梁長城) is Former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Th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TANG, Hayes Hei-Hang (鄧希恒)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Leadership,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 Luke Chung-Hei (陳仲熙) is Former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